

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者思想困境与应对

王一雪, 邓艳彤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401)

摘要: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 资本通过与数字的结合, 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武装意识形态斗争, 以不断实现控制劳动者的目的。数字时代劳动者面临着劳动者能动性、主体性消解、思考能力弱化、精神疏离、心理虚空等意识困境。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考察数字时代劳动者意识困境原因, 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后追求资本价值增值的运行规律。因此, 在中国式数字文明建构征程中, 需要时刻警惕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消解当代劳动者受数字资本控制的风险, 充分发挥中国式数字优势, 以数字共建共享保障劳动者主体性, 实现精神自由与解放。

关键词: 数字时代; 思想规训; 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4)04-0055-05

DOI: 10.13834/j.cnki.czsfxxyxb.2024.04.007

当今, 数字科技成为大众生活的主要载体, 资本也借助数字呈现出新形态即数字资本主义, 而数字时代劳动者思想遭到了信息资本的规训、侵蚀与遮蔽。借助马克思唯物史观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掌控, 可以深入探讨意识与行动关系的本质, 揭示资本控制当代劳动者意识的深层根源。数字化浪潮已将每个人都纳入其影响范围内,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者思想层面带来的隐忧,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 以期消解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 这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数字文明过程中需要应对的问题, 也是确保数字技术能够真正沿着有利于人类福祉方向前进的必要。

一、数字时代劳动者意识困境的表征样态

(一) 数字网络中的思想规训消解主体能动性

马克思认为, 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正是由于这一点, 人才是类存在物。”^[1] 人因为是类存在物, 所以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这样人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数字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转变, 看似在不断促进人们自由意识的回归, 实则是资本扩大了对劳动者的控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本将对肉体的外部控制转变为对精神思想的隐性塑造。

资本将现存体制的内容通过数字符号和景观方式呈现出来, 实现了从制造需要到制造欲望的转化, 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对资本制度的规训和认同。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对真实生活的贫困化、奴役和否定”^[2]。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了景观社会即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以图像、影像或事物所产生的意象化图景, 而数字技术则承袭和延伸了景观内容生成了数字景观。通过让人们在统治者和资本家制定的生产和消费中做出选择, 人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充满了被资本装饰过的欲望对象, 而在这种基于肯定和顺应的统一意识中, 呈现的是对现有制度的直接肯定。资本运用数字智能技术精准分析大众群体的动态趋势, 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内容和喜好兴趣等进行“用户画像”, 进而获取并控制主体的欲望需求。资本掌握大众的数据资料后, 可以利用主体的潜在欲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体的选择行为。精神代替身体成为高效率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进入了一种具有高层次的智能化社会状态, 智能化的生活模式使我们的生活越发

收稿日期: 2024-11-25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科学思想市场中认知与价值问题研究”, 编号: 21FZX060。

作者简介: 王一雪(1990-), 女, 河北廊坊人,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科学知识经济学;

邓艳彤(1999-), 女, 河北沧州人,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55 •

便捷和完美,人们也越发依赖于数字工具。数字智能使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丧失,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能力被进一步限制,劳动者变成了一种自动化劳动工具。

(二)繁杂信息弱化思考能力,遮蔽精神需求

当代生活实践和经济生产正越来越数字化,数字媒体和通信日益成为生产实践的核心工具,突显了数字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资本通过数字技术构建出隐蔽掌控劳动者的手段,借助娱乐、消费、文化等内容构建了数字霸权,继续将资本增殖逻辑作为其运行核心,将大众圈禁在过剩的信息、交往和表达中,大众无法在过多的信息中快速分辨有益内容,也无法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和思考,只是麻木地简单地浏览信息。数字媒体看似将劳动者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享受愉快的闲暇时间,但是又无形中将其束缚在工作中,只要将数字媒体工具带在身上,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工作。数字媒介积极鼓励大众分享与参与,同时会对其喜好做出推送,个体会沉浸其中,故此将付诸大量时间。

繁杂信息在时空范围内的大量泛滥遮蔽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推动大众分离。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以前阻碍政治行动进行的是人们无法及时获得足够多信息、交流和表达,而如今人们面临着过多消息,人们被过剩消息、交流以及表达而淹没,却不知道什么是有用、有效内容。而“政治行动和解放问题上主要处于危险之中的,不是信息、交往和表达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量”^[3]。人们对无用信息的关注也促进了这些内容的生长,人们越是喜欢浏览观看这些信息,这种信息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大,它们控制人们思想的能力也会越大。这些信息使得大众变得碎片化和分散化,不断扼杀其创造有用价值的能力。资本对大众的时间和空间的控制都扩展了,不仅剥削大众的劳动和生产时间,还要奴役人们的非劳动时间,使得大众丧失主动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使人们不再发现自己真实需求,而是不断服务于资本剩余价值增殖和盲目拥护现存制度。

(三)劳动者非在场及其在生产中的精神疏离

资本将生产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得大众处于普遍性生产之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马克思在很早的时候就对信息与交往做出了区别,他认为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农民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因为农民分散在农村,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没有进行集体政治行动的能力。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市的无产阶级,他们之

间能够互相交流,从而能够在政治上形成行动力量。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阶级,是因为无产者拥有农民所没有的交往交流,而这种交往交流正是在物质的工厂中的、有形的现实生活中而得到增强的。阶级与政治行动的基础不是通过简单的信息或者思想传播而形成的,而是通过政治情感的构建形成的,这种政治情感需要物质上的接近。随着数字网络的快速发展,数字媒体逐渐成为当代人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数字媒体缩短了人们之间的交流距离和时间。虽然脸书、推特等其他互联网交流机制在一定程度是有用的,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过现实身体的实际聚集,以及作为集体政治智慧和行动基础的有形交往。

在人们的交流中,面对面交流是主要交流方式,口头语言、肢体语言、面部表情都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方式,这些交流方式赋予人们多层次、多维度的身体和情感感应,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而数字媒体的性质使得交流缺失了在场性和主体性,数字化交流造成真实身体感知的消失,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交流方式是简单的、肤浅的信息发送与接收的工作模式,不再具有传统面对面交流所能传递复杂微妙情感的能力。数字交流主体逐渐成为信息传递的中介,主体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数字信息的传递。这种非在场性的共时的数字媒介交流方式,打破了现代性的自我主体模式,实现了交流主体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建构了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体的后现代性主体,造成了当代劳动者生活情况和利益关系难以完全沟通,精神共鸣难以产生。

(四)分工细化与劳动者物理分离、心理虚空

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统福特制生产模式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这种模式不仅继承了福特制的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和高效率等特点,还融入了数字技术的灵活性、个性化和网络化特性。福特制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带来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新业态崛起,打破了传统工厂、公司的边界,发展了个性化、差异化和精致化弹性生产模式,促进了个性化工作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数字平台经济造就了大量自由职业者,工作时空界限的模糊推动了劳动者的物理分离。电商销售、网络博主、在线生活服务等行业兴起,使得工作方式更加便利。劳动者可以在家中独立从事工作,无需聚集或依赖大型设备,即可完成工作任务。与传统工业时代相比,他们不再被迫集中

于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也不完全受资本家支配,而是拥有相对自主的劳动选择。数字时代的劳动工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工业时期劳动场所固定的情况,自由选择劳动工作内容和地点,但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劳动者可能在下班后仍需要处理工作事务,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交杂,引发其心理疲惫和虚空感。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加剧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工人情感异化,催生劳动者的心理虚空。数字社会的分工将劳动个体变为畸形之物,化身为纯粹的经济存在,失去丰富情感和欲望,沦为抽象劳动者,成为生产他人财富的工具。数字时代的工作特征加大了劳动者的流动性,使得他们缺乏稳定的归属感,从而导致社会认同感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情感异化。单调性与虚拟性的工作削弱了人的感知能力,使得传统工人拥有的闲暇时间所进行的有限文化艺术感也消失殆尽,劳动工人的精神变得麻木。当代劳动者面临物理和心理的双重分离,他们之间无法通过有形物质接触产生实体联系,劳动工人之间的关系只存在于虚拟网络中,导致劳动者之间的情感联系趋于分散。

二、数字时代劳动者意识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数字技术引发的系列现象作为直接原因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网络规模显著扩大,无线网络范围覆盖到全球各地,将越来越多的用户和设备收纳其中。数字技术的传输速度与能力增强,提供了更加高效的通信交流和数据交互。为推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时间最大化延长,资本不断通过暴力威压等手段强迫劳动者,虽然在数字化社会已很少出现直接明显的外在压迫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隐秘的软性约束力量和心理压制策略,这些无形之力依旧在悄无声息地驾驭着劳动力。其中关键内容在于利用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平台创造了一种超越物理界限的环境,使得数字信息、无所不在地渗透于劳动者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数字网络中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定制化广告的精确投放,以及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推崇,共同塑造了一个有利于数字资本扩张的社会文化生态。这些因素在不知不觉中操纵着人们的欲望,激发更多消费娱乐需求和更长时间的线上活动,最终导致劳动者所有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

数字智能的进步与升级使得人们获得了更多自由,但也使得劳动主体无法通过对象性活动感知自

身存在,大众对智能技术依赖导致劳动者较少直接参与劳动过程,不再依靠自身劳动技能和能力,这使得他们的脑力和体力逐渐衰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没有随着科技进步和政治解放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沦为单纯的机器附属品,作为商品一样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将传统工业社会打造为物化社会,社会中的商品、货币、资本都成为人们追崇的对象,而在数字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智能拜物教^[3]。过分崇拜智能技术和数字数据导致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人工智能代替人们做出决策与选择,并且抢占人的劳动创造价值。对数字技术的追求造成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占据上位,追求功利成为大众的首要目标,从而无视情感、精神价值的需求,导致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异化和物化。

(二)非物质劳动的持续扩展作为显性原因

生产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表现方式,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现人自身与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劳动从内在物质规定性分为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中的大部分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上升、科学技术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劳动开始脱离物质生产劳动,成为非物质劳动。

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背景下提出“非物质劳动”,信息化革命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传统工业物质劳动转向信息化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与传统物质劳动存在不同的地方。首先,劳动方式的改变。在传统物质劳动中,劳动工人需要操作特定的工业工具,完成固定工作流程,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内容。而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者主要提供信息、情感、服务等无形内容。其次,劳动组织形式的改变。在传统物质劳动中,工人聚集在工厂,通过机器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完成生产过程。而非物质劳动打破了传统工厂模式,网络成为劳动者工作的主要场所,人们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从事劳动,而是借助网络无时间与地域限制地展开劳动^[4]。最后,劳动时间与劳动者关系的改变。在传统物质劳动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占据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获取剩余价值,工人还存在一定的自由时间。而非物质劳动将劳动者全部时间转换为劳动时间,看似自由闲暇的时间也在为资本创造价值。

非物质劳动在当代变得更加广泛,特别是数字劳动领域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大量的非物质劳动形

式。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信息技术、在线教育、远程协作、创意产业等领域,还包括了诸如内容创作、社交媒体管理、虚拟客服等多种新型职业。非物质劳动似乎呈现出较物质劳动更为自由自主的特点,但是实际剥削关系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为隐蔽和不平等,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本质与现实社会关系。而非物质劳动并不代表着劳动成为了自由的活动,其仍然属于生产性劳动,“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就是使资本增殖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5],数字化的非物质劳动依然在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那么非物质劳动就是一种生产性劳动,因此非物质劳动所带来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愈加严重。

(三)资本逻辑及剥削的隐蔽化作为根本原因

对于现代劳动者意识危机的原因溯源和揭露批判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资本逻辑即追求剩余价值。数字资本“是一种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价值增殖的剥削性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6],通过建构驯顺劳动者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规训逻辑。思想规训的目的在于弱化人的自我意识、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使个体不断地自我培育、自我纠正而以有用的肉体融入资本高效率的生产系统,从而保证人的生命对资本权力的绝对服从”^[7],通过思想诱导的规训机制,最终使劳动者意识深处归化于资本主义,形成有利于价值增殖的自动化行为。在数字资本权力的思想规训体制中,使劳动者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并形成有利于价值增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习惯,最终形塑出内在认同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和思想体系并主动将自身贡献于资本的劳动者主体。

数字资本逐渐代替工业资本成为资本新型生产方式,数字资本剥削的隐蔽化可能减慢劳动者反抗意识的获得和发展。在传统工业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工人只是单纯地被资本奴役其劳动。如今,资本运行逻辑在数字的加持下呈现出高强度化和规范化的特征,在数字智能技术的推动下,劳动从抽象的实体形态进一步扩大到了网络虚拟形态。同时,剥削工人的情况发生了升级,从显性物质剥削拓展为隐性化无偿加班,高科技手段监视工人等手段,剥削方式不仅有传统工厂带来的赤裸裸的压榨,还有隐性的数字平台剥削,即无偿掠夺数字平台用户的劳动,以提高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的“使用价值隐藏了对于单个用户来说看不见的和难以追踪的剥削关系”^[8],在这种隐蔽的规训机制下,人们越来越沉迷于能够获得“愉

悦感”的数字活动和数字交往中。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网络用户对数字平台的依赖性,将娱乐和消费行为包装为数字劳动,将数字活动者转换为“产消合一”的数字劳动者,对劳动者展开一种极端的隐性剥削,在网络虚拟平台展开无形的劳动生产关系。“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9]网络用户为资本生产数据剩余价值的方法不断推动着资本不断提高数字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造成用户不断推动着资本积累增殖,进而陷入一种无限循环的情况。劳动者本身主体性被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取代,人类的生产劳动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客体,其主体性身份逐渐在现实存在方式中抽离出来。资本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剥削劳动者,劳动者意识不到自身正在被剥削的实质,并且心甘情愿为资本主义创造价值。

三、数字时代劳动者意识困境化解路径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数字劳动者主体意识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我们可以发现资本逻辑控制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对现代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而劳动者要想获得意识解放,就要从数字资本塑造的欲望束缚中解脱出来,识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假象,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从而打开劳动者意识解放的道路。当今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呈现出两面性,不仅为人们的娱乐与工作提供了便利,也成为压迫工人的新型工具,使人们陷入更为沉重的信息束缚。唯有消除数字信息对人们的支配,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真实的自由时间,走出资本主义塑造的虚假共同体,迈向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共产主义共同体,人们才能进行真正的精神生活生产,实现超越资本的精神意识与自由。积极利用网络理论与政策宣传的灌输方式,不断教育劳动者提高对资本主义陷阱的警惕性。只有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劳动者对数字劳动的认识,增强辨别数字劳动资本与数字劳动异化的能力,才能厘清资本剥削本质,树立正确新时代劳动观。

(二)规范数字资本技术,健全网络平台监管制度

数字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仍然是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也在资本的掌握下成为异化和剥削工人劳动的工具。为摒弃资本数字技术的控制,实现科学技术对人的真正解放,必须

加强对资本数字平台的法治化规范。强化数字平台的治理,谨防数字资本主义的陷阱,对跨国数字平台对用户信息数据的强制占有保持高度警惕,捍卫自身数字信息主权。反对数字霸权资本主义的垄断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数字平台与网络空间。明确数据的共享性与共有性,消除数据的隐性霸权,加强信息数据的开放公共使用。重塑数字网络人的主体性地位,重视对劳动者的数字信息教育,精准识别网络中资本价值引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优势,正确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构建社会良好意识形态生态,持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与凝聚力,将当代劳动者从资本数字价值和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

(三)创新数字技术形态,消解数字技术异化弊端

以中国式优势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作用,用技术创新推动数字劳动良性发展。在推动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工具性属性,确保技术发展是为了服务人类,而非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数字技术本质上是人类劳动能力的扩展。因此,我们反对的是将其用于资本剥削的应用方式,而不是数字技术本身。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运行逻辑与人本主义理念耦合,依据劳动者的生理结构、个性化需要、工作习惯等方面进行数字技术优化和调整,把劳动者主体性放在首位,进一步激发劳动者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确保数字技术的应用真正致力于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愿景。

综上,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就数字经济下资本所裹挟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思想规训展开分析,发现与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相比,现代社会中的资本

通过数字技术,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者意识形态的塑造,使他们往往处于一种较为被动、麻木的状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因此,解决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思想困境,克服其主体性危机,关键在于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合理规范数字资本的发展,明确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激发并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使其能够在数字时代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精神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3] 蓝江. 从智能拜物教到算法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05):15-23.
- [4] 程彪,赵虹. 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思想分歧[J]. 长白学刊,2023(04):40-48.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姜英华. 数字资本的时间变构与时间规训及其异化后果[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3):11-19.
- [7] 徐艳如. 数字拜物教的秘密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6):105-113.
- [8] 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Construction of a Customized Employment Service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ANG Yixue, DENG Yanto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Digital capitalism is seen as a new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capitalism is a new change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apital, by combining with the digital realm and through informatizatio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rms ideological struggles to continuously achieve the goal of controlling laborers. In the digital age, laborers face consciousness dilemmas such as the dissolution of their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weakened thinking ability, mental alie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mptiness. By examin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 consciousness dilemmas of laborers in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y, we can uncover the operational laws behi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at pursue capital value accumulation. Therefo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style digital civil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the negative impacts brought by digital capitalism, mitigate the risks faced by contemporary (下转第 84 页)

- 光九年(1829).
- [12] 赵贻哲. 尤庄子赵氏家谱·一次修谱序[M]. 刻本. 同治十一年(1872).
- [13] 赵介眉. 盐邑赵氏族谱·续修族谱序[M]. 刻本. 道光六年(1826).
- [14] 张星久,陈青霞. 从族谱看传统政治思想的民间表达与实践[J]. 江苏社会科学,2019(06):232-241+260.
- [15] 王锡. 青县周庄子王氏家谱·原序[M]. 刻本. 光绪七年(1881).
- [16] 高鸿书. 孟村高氏家谱·三修高氏家谱序[M]. 抄本. 道光十七年(1837).
- [17] 贾恩绂. 盐山傅氏族谱·序[M]. 刻本. 光绪十七年(1891).
- [18] 王步云. 东光王氏族谱·序[M]. 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
- [19] 朱芳谱,朱遇春. 青县朱氏家谱·序[M]. 刻本. 同治九年(1870).
- [20] 田智. 南皮田氏族谱·谱序[M]. 刻本. 咸丰六年(1856).
- [21] 姜维纶. 沧县姜氏族谱·原序[M]. 抄本. 乾隆五十三年(1788).
- [22] 高绳武. 盐山仁亲堂高家营高氏谱书·原序[M]. 刻本. 同治五年(1866).
- [23] 姚惠. 青县姚氏家谱·初修谱序[M]. 刻本. 乾隆二十五年(1760).

Folk Genealogy Sequence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ypes, Contents and Values of Cangzhou Folk Genealogy Sequences in Qing Dynasty

YAO Lixia, MA Yingxin, FAN Zheng

(Chinese Department,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angzhou, Hebei 061001, China)

Abstract: Genealogy is a historical record that documents the lineage and significant events of a clan connected by blood relations. The prefac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enealogy, serves to lead the entire text and clarify its main purpose. The prefaces of folk genealogies from Cang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pan ten periods from the Shunzhi to the Xuanton era, including types such as self-prefaces, guest prefaces, general prefaces, and branch prefaces. The prefaces contain not only content that reflects traditional writing concepts, such as introducing clan history, explaining the reasons and purposes for compiling the genealogy, and narrat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but also content that reflects social changes and local culture. The folk genealogy prefaces of Cang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possess certain cultural value in genealogy studies, local culture, and ethical culture,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ing family history, loc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Cangzhou; folk genealogy prefaces; cultural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罗 萍]

(上接第 59 页) laborers under the control of digital capital, and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digital capabilities to ensure the subjectivity of laborers, achieving spiritual freedom and liberation.

Key words: digital age; ideological discipline; laborers

[责任编辑:孔令升]